

【俄罗斯文学】

# 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叙事的现象学解读

刁科梅 屈凡恺

**【摘要】**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是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以非虚构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其叙事与一般虚构小说不同，带有明显的现象学特征：叙事呈“原真还原”和“交互主体性”相呼应的双层样式。“原真还原”叙事以描述性语言，现象学“悬搁”、“回忆”、“联想”的方式，达到还原核灾难事件的目的；“交互主体性”叙事以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形成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实现对核灾难事件还原的深化。上述两层现象学叙事最终都指向对核灾难事件进行现象学性质的反思。

**【关键词】**《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阿列克谢耶维奇；叙事；现象学

**【作者简介】**刁科梅，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宗教哲学；屈凡恺，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原文出处】**《当代外国文学》（南京），2022.2.95～1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关系研究”（20BZJ029）的阶段性成果。

纪实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的作者是白俄罗斯记者、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 A. Alexievic, 1948-），她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部反映苏联时期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纪实小说中，作家不仅描述了核灾难亲历者们口述的回忆，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文献资料、新闻报道等。小说看似纷杂、松散，但通过研究发现，其叙事表现为现象学的“原真还原”和“交互主体性”相呼应的双层样式，并具有开放对话性。通过这种现象学叙事方式，作家达到了“还原”核灾难真相和对其“反思”的写作目的。

## 一、现象学的“原真还原”叙事

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中，作家通过“描述”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差不多90多个受访者的回忆，以第一人称我（口述者）的方式，还原核灾难发生时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种突出个体自我对核灾难认识的方法，正是现象学“原真还原”

法：“排除对我而言‘异己之物’，被保留下来的则是对我而言的‘本己之物’”（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432）。

首先，在小说这种“原真还原”叙事中，作家全文使用“描述”性语言来记录口述者的回忆，没有作者和叙述者的参与，这种“描述”具有客观性。其作用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倡导的“描述”方法作用相同，即“现象学的描述排除任何对内在被给予性的超越解释，也排除那种作为实体自我的‘心理行为和状态’的超越解释”（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92）。也就是说，作者运用“描述”性语言是为了如实记录回忆者所述，剔除作者对此事件的“说明”和“解释”。而“说明”与“解释”都是对事物的一种构造，也就是加入了说明和解释者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不利于事件本身的还原。

其次，为了实现还原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这一事件，在小说文本中，作家没有着重描写核灾难发生时

的具体情况,即客观事件,而是把重心放在核灾难,即客观事件在各位口述者意识中是如何呈现上。几乎全文都利用口述者们的“回忆”来还原这一事件,这正是现象学认识事物的方法,即世界在意识中的呈现。因为“回忆”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回忆”中所呈现的核灾难,当然是在意识中呈现的核灾难。而且,“回忆不仅仅是关于过去对象意识,而且是关于曾经被感知的、并且被我感知过的、在我的过去的此时此地曾经被给予过的对象意识”(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148)。也就是说,亲历者的回忆是对当时核灾难亲历者本已认识的再现,不是作家或亲历者的凭空想象,而是一种经验的再现,是事件在亲历者意识中的呈现。这也是现象学所强调的,认识主体(也就是人)在认识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胡塞尔认为,“每个人都有无可否认的权利把世界接受为现实存在”(Husserl, *Ideas* xlii)。所以,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口述者自我意识中“原真还原”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但是,这种“还原”在具有“唯我性”的同时,还带有对话性。

这种对话性表现在面对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时,口述者对核灾难的回忆里明显带有与对此事件他者声音的批驳。据亲历者回忆,对核事故,政府的态度是极力掩盖:“我们接到了上级传达下来的警告命令:为了国家利益,回去后,我们最好不要告诉人们自己在这里看到了什么”(64)。医生也极力隐瞒核辐射对人的伤害程度:“医生们写道:7贝克。可事实上,这一真实数据应该是600贝克!”(125)。而媒体则夸大其词,故弄玄虚:“报纸和杂志为了竞争,相互攀比,看谁能写出最吓人的文章”(113)。还有在民间流传的各种谣言:“长着三个脑袋的小鸟,小鸡把狐狸啄死了,刺猬的刺掉光了”(99)。这些“掩盖”、“隐瞒”、“夸大其词”、“谣言”等声音,在口述者们的回忆里,是批驳的对象和应该“搁置”的东西,也就是“原真还原”里的“异己之物”。在亲历者们的口述回忆里,“还原”后的真相是:“现在,河上和湖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没有头或尾巴的梭子鱼。树林里的动物都因为放射性物质的辐射而得了奇怪的疾病。悲伤的它们四处游荡,这些动物都长着一双悲哀的眼睛”(118)。

最后,为了更加深刻认识核灾难,更进一步实现对事件的还原,在口述者们的回忆中,还伴随着口述

者们对核灾难的“联想”,联想到战争和启示录。联想,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由一事物想到另一有关事物的思维过程。而胡塞尔认为,“联想是当下被给予之物使我回忆起过去的相似之物,这个回忆的过程基于当下之物与过去之物的相似性”(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62)。这种“相似性联想”不仅可以引发朝向过去的回忆活动,也可以引发朝向未来的进一步的统觉活动(陈伟24)。在“还原”核灾难这一事件中,“相似性联想”所引发的这两种活动都存在。

回忆过去的“联想”。这主要体现在核灾难“联想”到战争。核灾难之所以“联想”到战争,是因为无论是灾难性,还是残酷性,两者极其相似,而且核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一场超越一切战争的战争——切尔诺贝利”(阿列克谢耶维奇27)。从古至今,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发生各种残酷的战争。但核爆的破坏力,在切尔诺贝利之前,只有日本广岛和长崎经历过。所以,用战争作为核灾难的参照对象,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核灾难给人带来的创伤和痛苦。

这种“相似性联想”引发的朝向过去的回忆活动,与整部作品讲述对核灾难的回忆不同。首先,回忆的对象不同。关于核灾难的回忆,回忆的对象是多方面的,包括事件本身,以及经历事件的人的各种感受。而“相似性联想”引发的回忆对象是战争。其次,回忆者的能动性不同。关于核灾难这一事件的回忆是一种“当下化”,是一种“再现”,是回忆者的主动行为。而“相似性联想”所引发的回忆(战争),最初是一种被相似物触发的被动行为。这种被动回忆的发生必然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对比核灾难与战争的异同之处,加深对核灾难的认识,完成“再造”。所以,前者是还原真相的呈现,后者是思考后的重新认识。

面向未来的“联想”。主要体现是由核灾难联想到《圣经》启示录中的场景。这一“联想”与上述的核灾难“联想”到战争不同,不同在于“相似性联想”引发的不是回忆,而是现象学所说的,引发的是面向未来的思考:“到了那儿,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奇异的世界里,在这里,你会有一种正在阅读《启示录》的感觉,《启示录》中的内容发人深省”(阿列克谢耶维奇73)。这一面向未来的思考,带有警示

性。思考核灾难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思考人类如何面对未来的发展。警示人们,如果不吸取核灾难发生的教训,那人类的未来就如同《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一样,这种思考和警示也是小说所要揭示的一个主题。

所以,通过回忆、批驳、“搁置”和“联想”之后,呈现出来的是核灾难亲历者对这一事件的经验,即“原真还原”后的核灾难:身边亲人、朋友和邻居接连生病去世,生活环境改变,政府强行要求当地居民撤离,人们被迫离开故土家园,经历了失去健康、亲人、家园的痛苦,核事故的破坏程度和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怕程度如同《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

## 二、现象学“交互主体性”叙事

从现象学视角看,作品在表层“原真还原”叙事之下,隐含着小说中人物一口述者与读者之间形成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们一起构成了小说的深层叙事。

首先,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有“交互主体性”关系形成的基础。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中,每一位口述者在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讲述所经历的核灾难时,更多的是倾诉自己在核灾难中的情感经历,其中提到最多的词是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对我们说了一大堆废话——你们会死。人们吓坏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恐惧”(7)。另外,还有“爱”,爱亲人,爱家乡,爱国家以及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科学、科学家们的“憎恨”:“因为我爱他,我爱他胜过一切……我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216-20);“他们把自己当做祭品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小伙子们并不是为了这些奖励才自告奋勇!”(122);“它将脚下的土地撕裂开来,然后将各种痛苦真真切切地砸在我们身上”(128);“总有一天,他们会开始四处搜捕这些科学家,就像中世纪的教廷到处逮捕医生,然后把他们全部淹死一样”(74)。所以,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会被这些强烈的情感笼罩,形成一种情感统摄。这种情感统摄的基础是人物一口述者、读者之间存在的“同感”。“同感”又称“移情”、“共情”,它又是小说中的人物一口述者与读者之间现象学“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基础。

其次,“交互主体性”运用到人际关系中,是指互为主体存在状态和我们一主体存在状态。也就是达

到人与人之间的“互识”和“共识”状态。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不是读者身边活生生的人,但由于人类意识中的“相似性统觉”作用,并不妨碍小说中的人物与读者之间“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形成。通过“同感”这种移情方式,把自己(读者)放在他人(人物一口述者)的位置去理解他人(人物一口述者),进入他人(人物一口述者)的知觉领域,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意向性的自我一主体的交互渗透和他们先验生活的意向性交互渗透”,达到一种对同一个对象之总和世界的心灵共识(王振林16)。于是,小说中人物一口述者的情感与读者的情感达到了相通,两者之间实现了“交互主体性”关系,进而达成了“共识”。但是,由于小说中每个人物所表达的情感和观点各不相同,人物思想之间存在着对话性。所以,引发读者思想的共鸣和“共识”也是开放对话性的。

最后,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想的对话也缘于“交互主体性”的存在。这部纪实小说采取采访亲历者、记录每一位亲历者口述回忆的形式。表面看,人物之间缺乏互动,不存在“复调小说”中人物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际上,这种人物间的对话是存在的。首先,因为胡塞尔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交互主体性”关系,“彼此为对方的相互存在”,他人的思想意识被我所知,存在于我的思想意识,他人也是如此(《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165)。所以,小说人物之间也是这样,存在着“交互主体性”关系。如对普通人舍身投入核事故现场清理工作这一行为,不同口述者有着不同的声音:清理人阿卡迪·菲林认为是“人们期望能够得到政府曾经许诺他们的那些待遇”(阿列克谢耶维奇76)。执行委员会代理负责人谢尔盖认为“小伙子们并不是为了这些奖励才自告奋勇!……我把他们当成是战争中的英雄”(122-25)。后者提出小伙子们是英雄,不是为了奖励,就是基于前者“为了政府许诺的待遇”的观点,但后者并不接受和认同这一观点,与前者展开了思想的交锋、对话。

另外,在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交互主体性”关系中存在着对话的基础:“平等”。“平等”也是现象学“交互主体性”中的一个核心词。因为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后,对此进行了说明:“在人的共同体意义上,在人——他即使是单个的,也本身具有共同体成员的意义——的意义上,这意味着一种彼此为

对方的相互存在。这种彼此为对方的存在造成我的此在与其他人的此在的客观化的平等”(《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158)。这种彼此间的平等也是对话的基础,“巴赫金主张面对面的平等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可以把不同的意识引进一个积极交流的对话情境,从而推动思想的展开、演进”(黄世权 108)。

此外,90多位口述者既是人物,又是叙述者,作者不是主导者,她在小说中和读者一样只是倾听者(高建华、曹爽 78)。每一位口述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去发声,“回忆”自己对核灾难的认识。作者没有在小说中对任何人物一口述者的言论加以评判,而是平等如实地“描述”给读者,让读者去进行思考和判断。小说中人物之间在思想意识上是独立平等的,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思想意志,相互交锋,形成平等对话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人物和读者之间“交互主体性”关系,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读者也参与到文本当中,与人物情感产生共鸣,与人物一起思考。这是对表层“原真还原”叙事的补充和完善,是主题思想的深化。

### 三、现象学叙事的“反思”意义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带有现象学特征的双层叙事结构,与申丹提出的小说“双重叙事进程”不同。“双重叙事进程”主要是针对虚构叙事作品,认为:“在不少虚构叙事作品中,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一股叙事暗流,自成一体,构成另外一种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均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3)。本文的双层叙事结构则不然,它针对纪实性文学作品,而且两层叙事和谐统一、相互补充,不存在相反和对立,两者都为呈现同一个核心意义服务,那就是“还原”核灾难真相后,对其进行现象学的“反思”。

在小说中,就核灾难谁之罪的问题,一位名叫尼古拉的口述者提出了这种“反思”:“我们必须知道谁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那个人是谁?是科学家,还是核电站的人?或者,是核电站的负责人?……我们要求关闭所有的核电站,并且把所有核物理学家关进监狱,可以吗?我们诅咒他们!可是,知识是无辜的,知识本身没有过错,学习和了解知识并不犯

法。今天,科学家也已经成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109)。显然,尼古拉的观点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对象化模式,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现象学“反思”。

现象学的“反思”与一般的反思不同,它是指“我们的意识目光不是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直向地面对空间事物,包括动植物、自然、人、社会、世界以及如此等等,而是反过来朝向我们意识本身的活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86)。这种“反思”关注的是人的心理或意识,而不是物理或自然的存在,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回归,也就是“通过现象学还原的进行而反思地把握到在此之前‘隐匿的’构造成就,并且因此而达到对自己本身的认识,即认识到自己是所有确然性和所有对世界的认识和拥有的原泉源”(365)。在小说中,这种现象学的“反思”不仅通过人物——口述者来表达,而且通过“交互主体”性叙事让读者一起参与其中。“反思”的目的是回归人的主体性,克服一统天下、理性至上的二元论。这也是小说现象学叙事的意义所在。

当今人类处于“最技术化的时代,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空虚的时代”(Ortega y Gasset 151)。如何面对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思考的问题。正如胡塞尔在追溯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时所说,“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欧洲科学的危机》15)。这是胡塞尔反思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意识的哲学导致人主体性的“自身遗忘”。也就是要求人们从人的意义的观点出发,重新评价科学、评价科学与人的关系,改变小说中口述者所说的:“核物理学家全部是国家的精英,只有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能进入这一领域。人性被暂时放到了一边”(阿列克谢耶维奇 171)。胡塞尔强调人的主体性,克服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回归正常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正如作家在小说结尾表达的:“我常常想,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226)。这里作家把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也就是个人感知当作最真实的存在,让现代人醒悟到“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如何]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倪梁康,《胡塞尔选集》981)。如同陀思妥

耶夫斯基小说《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地下室人”发出的呼喊一样:为什么一定是“2+2=4”?难道只有理性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吗?

### 结语

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之所以叙事带有现象学特征,主要原因是文体风格特点符合现象学方法的一些特征,这是两者联系在一起纽带。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李辉23)。纪实文学作品追求真实性,以写实性描述为主;现象学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排斥所有成见,关注实事本身,根据现象自身所显现的来描述它们,从而把握住各种现象的本质(倪梁康,《意识的向度》233)。可见,“求真性”和“描述性”既是纪实性文学作品的特征,也是现象学的特征。基于这两大共性特征,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叙事特点具有可行性,这也许就是本文研究的总结性思考和发现。

### 参考文献:

[1]Alexievich, S. A.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Trans. Wang Tiantian. Nanjing: Phenix Press, 2012.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王甜甜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

[2]Chen, Wei. "Similarity Association and Similarity Apperception: Also on the Two Types of Husserl's Genetic Phenomenology." *Academic Research* 9(2017): 24-28.

[陈伟:《相似性联想与相似化统觉——兼论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两种类型》,《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第24-28页。]

[3]Gao, Jianhua, and Cao Shuang. "Th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Life Writing in Alexievich's Works." *Russian Literature & Art* 3(2017): 77-84.

[高建华、曹爽:《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叙事策略与生命书写》,《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3期,第77-84页。]

[4]Huang, Shiquan. "Polyphony Theory and Phenomenology: The Origin of Bakhtin's Way of Thinking." *Russian Literature & Art* 3(2017): 105-12.

[黄世权:《复调理论与现象学:巴赫金思想方式探源》,《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3期,第105-12页。]

[5]Husserl, Edmu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 Wang Bingwe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6]---. *Descartes' Meditations and Lectures in Paris*. Trans. Ni Liangk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Trans. W. R. Boyce Gib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8]Li, Hui. "Documentary Literature: Facing the Reality and Pursuing History: On the Documentary Volume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1977-2000)."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1(2009): 21-27.

[李辉:《纪实文学:直面现实,追寻历史——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纪实卷(1977-2000)》,《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第21-27页。]

[9]Ni, Liangkang. *The Dimension of Consciousness: A Study of Phenomenological Problems with Husserl as the Axi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倪梁康:《意识的向度——以胡塞尔为轴心的现象学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10]---. *An Explanation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1]---. *Husserl Anthology*. Shanghai: Shanghai SXD Joint Publishing House, 1997.

[倪梁康编:《胡塞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12]---. *Phenomenology and Its Eff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13]Ortega y Gasset, José. *Toward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41. Shen, Dan. *Research on the Double Narrative Process*. Beijing: Peking U P, 2021.

[申丹:《双层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14]Wang, Zhenlin. "An Analysis of Husserl's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1999): 13-17.

[王振林:《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理论评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3-17页。]